

变局与重塑: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的阶段性影响

秦存誉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深刻影响着中原腹地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第一阶段的西进促进了秦王寨文化的创生及后者对郑州地区、沙颍河流域、伊洛河流域和太行山南麓文化因素的整合。第二阶段的西进使得这些区域“大汶口化”,外来器物、人口等的全面融入使得中原腹地的文化特征和聚落形态都有了显著变化,中原地区的社会重心逐渐由陕豫晋相邻地区转移到嵩山附近。第三阶段的西进重塑了中原腹地的文化格局,除郑州地区的秦王寨文化仍在顽强发展外,其他区域相继被纳入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展进程或演变出新的文化类型。

关键词:大汶口文化 秦王寨文化 中原腹地 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一支存续长久、分布广泛、内涵丰富、辐射深远的考古学文化。结合早年认识^[1]和最新年代学研究进展^[2],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800—前3500、前3500—前3000、前3000—前2400年,大致对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中原腹地处于中原地区中部偏东,在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扩张的浪潮中深受影响^[3],文化面貌发生剧烈变化,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多元因素融合”的特殊遗存,即秦王寨文化。该文化是介于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晚期之间的一类遗存,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分早、中、晚三期,各期分别以大河村仰韶文化三、四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即大河村五期)为代表^[4]。

大汶口、秦王寨文化发展期间,中原腹地及周边地区还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如庙底沟、庙底沟二期、大司空、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关于这些文化的绝对年代,学界仍有较多分歧,笔者暂以大汶口、秦王寨文化为标尺确立它们的年代对应关系:庙底沟、西王村、庙底沟二

期文化分别为公元前3800—前3100、前3100—前2700、前2700—前2300年^[5],大司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分别为公元前3100—前2700、前2700—前2400年^[6],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别为公元前4000—前3100、前3200—前2500、前2600—前2200年^[7]。在此基础上,笔者拟探讨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秦王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影响问题。

一、初步影响:中原腹地的变局与新型文化的创生

“中原腹地”是学界惯用却未严格明确范围的术语,往往依研究对象和时段划定^[8]。本文的中原腹地指环嵩山地区,行政区划包括河南郑州、洛阳、许昌、平顶山、焦作、新乡等地市及所辖全部或部分县(市)。该区地理位置独特,东临海岱地区,南接江汉地区,是多元文化汇聚地。因此,相较于陕豫晋相邻地区,其文化因素更加多元,文化面貌也更复杂,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实力强弱的缩影,也是反映周边文化势力对中原文化影响程度的“晴雨表”。

收稿日期 2024-03-26

作者简介 秦存誉(1990—),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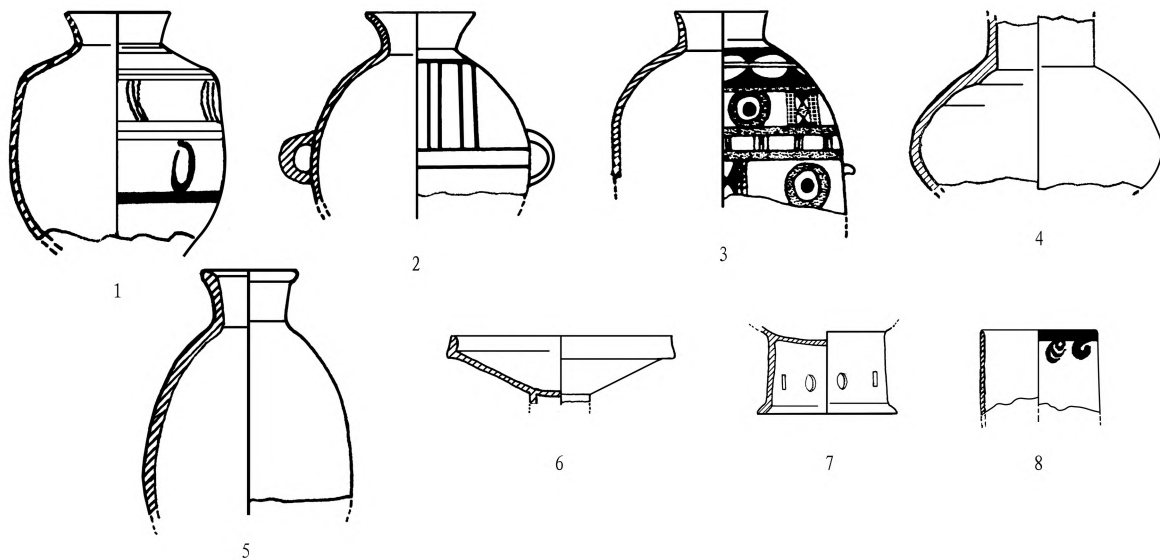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河南浍池关家遗址裴李岗至仰韶中期遗存整理与综合研究”(24CKG006)。

中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仅在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有少量发现^[9]。裴李岗时代,目前发现的百余处遗址皆属裴李岗文化,大致可分出贾湖和裴李岗两种类型^[10]。仰韶时代早期,中原腹地的文化面貌不再一致,河南嵩山东北为后岗一期文化^[11],以西为枣园、东庄文化^[12]。仰韶时代中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13]。整体而言,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中期,中原腹地的文化格局虽然呈现出“整合—分化—整合”的折线型演进趋势,但以目前材料来看,始终由中原文化系统主导,鲜见外来因素的制约。

仰韶时代中期末段,即以泉护一期Ⅲ段、西坡为代表的阶段^[14],除庙底沟文化核心区——陕豫晋相邻地区外,中原其他区域陆续脱离庙底沟文化控制,进入仰韶时代晚期^[15]。中原腹地以大河村仰韶三期^[16]、石固七期^[17]为代表的秦王寨文化早期遗存普遍叠压在庙底沟文化遗存之上。此外,在陶器群方面还直接沿用或加以改造庙底沟文化经典因素,如小口尖底瓶、鼓肩罐、彩陶罐、彩陶鼓肩钵、敛口瓮、卷沿曲腹盆等器形以及弧线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花瓣纹等彩陶图案,表明秦王寨文化是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秦王寨文化早期陶器中还有一些大汶口文化中期因素(图一)。豫东地区经过侯家寨文化^[18]、“马庄文化”第二期^[19]等遗存的发展,逐渐被纳入秦王寨文化发展进程——周口^[20]、开封^[21]、商丘^[22]等地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基本都可归入秦王寨文化——但又很快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周口烟草公司^[23]、尉氏椅圈马四期^[24]等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和背壶、彩陶背壶、镂孔豆、觚形杯等就是例证。突破豫东后,大汶口文化很快挺进中原腹地,输入镂孔豆、彩陶杯、直领壶、弧领壶、粗圈足豆等异于中原风格的器形,彩陶图案中的六角星纹可能是参考八角星纹创造的^[25]。这些因素极大丰富了秦王寨文化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秦王寨文化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似乎是单向的,以前者吸纳融合后者为主。尽管山东邹县野店 M33^[26]、泰安大汶口 M2011^[27]、江苏邳县大墩子 M33^[28]等出土的敛口彩陶钵、折腹罐与秦王寨文化早期同类器的形制特征相似,但与庙底沟文化风格更为接近,尤其是彩陶上的弧边三角纹、花瓣纹等图案显然受其影响产生。另需注意的是,秦王寨文化的部分海岱系陶器与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相同,部分则存在细部差异,反映出秦王寨文化对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吸纳不仅仅是被动的全盘接受,同时还有主动的技术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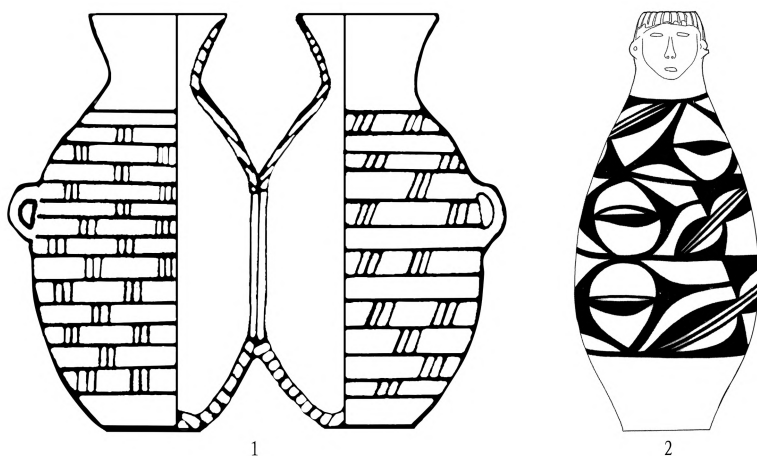
图一// 秦王寨文化早期遗存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

1、2. 彩陶壶(F20:26、T43⑧:27) 3. 彩陶背壶(F32:8) 4、5. 小口壶(75采:35、T43⑨:29)

6、7. 矮圈足豆(W128:1、T35⑤:15) 8. 彩陶杯(H1757:7)

(4出自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8出自郑州西山遗址,其余出自郑州大河村遗址)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一件兼具秦王寨文化因素与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彩陶双连壶F1:29,两壶均尖唇、喇叭口、高弧领、溜肩、深弧腹、小平底,腹中部偏上对称附着一对小耳,器表饰平行线纹、短线纹,整体形制酷似两个昂首挺胸、身着条纹衣服、手挽手的小人(图二:1)^[29]。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曾出土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QD0:19^[30],除口部修整成人头形外,余部与双连壶极为相似,说明仰韶文化中晚期确有“以器塑人”的风尚(图二:2)。



图二// 彩陶双连壶与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1.彩陶双连壶(F1:29) 2.人头形器口彩陶瓶(QD0:19)

(1出自大河村遗址,2出自大地湾遗址)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江汉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同样参与了秦王寨文化的形成过程。从油子岭文化传入的三足器(鼎)和圈足器(盘、碗、豆、器座)等,尤其是线条流畅、形体匀称的罐形鼎和瓮形鼎,与大汶口文化棱角分明的折腹鼎和盆形鼎判然有别。若剔除庙底沟文化遗留的弦纹鼎,便可以轻易看出,秦王寨文化陶鼎在形成之初多为油子岭文化因素陶鼎,稍后才出现更高比例的大汶口文化因素陶鼎。但是油子岭文化主要影响鄂西北豫西南,且在不久后就被屈家岭文化整合^[31],因而大汶口文化对秦王寨文化的影响更具持久性。

综上,大汶口文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原腹地的文化面貌,通过博采众长与吸纳融合,催生了同时包含中原仰韶旧传统与海岱及江汉新风尚的“混合型”遗存——秦王寨文化,中断了庙底沟文化的发展进程。此后,中原腹地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开始营建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西山,荥阳汪沟、青台,宜阳苏羊等环壕聚落或城址,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重心也逐渐由陕豫晋相邻地区转移到郑州西北。

二、深入影响:中原腹地的“大汶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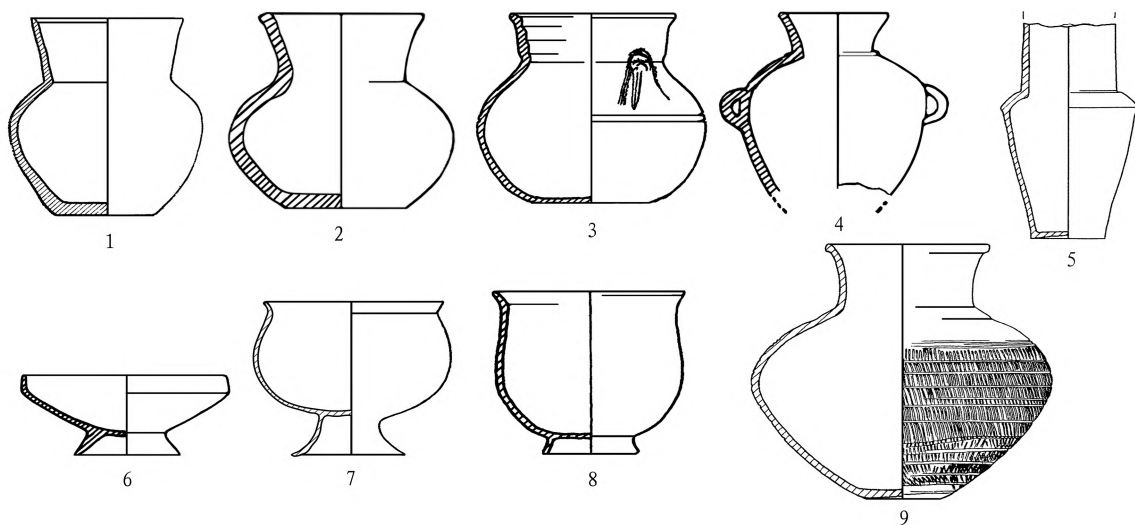
如果说大汶口文化中期对中原腹地的影响尚且轻微,那么晚期(相当于秦王寨文化中期,即以大河村仰韶四期,石固八期,王湾二期2、3段^[32],滩小关三期^[33]等为代表的阶段)的影响就是全方位渗透了。

豫东及邻近的皖北、鲁西南地区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主要见于河南郸城段寨^[34]、

鹿邑栾台^[35]、商水章华台^[36]、夏邑清凉山^[37],安徽蒙城尉迟寺^[38]、萧县花家寺^[39]、亳县付庄^[40]等遗址,陶器组合有篮纹罐形鼎、高领罐、鬲、尖底缸、盃、背壶、长颈壶、短颈壶、圈足尊、高柄杯、觚形杯、圈足豆等。对比可知,大部分器形与山东秦安大汶口^[41]、邹县野店^[42]、曲阜南兴埠^[43]、曲阜西夏侯^[44]、枣庄建新^[45]等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相似,明显属于同一文化范畴。目前学界普遍将这类遗存称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46]。

除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外,尉迟寺类型还有一些地域因素^[47],如大口深腹罐、高领罐、长颈壶、矮领壶、薄胎筒腹杯等。另在段寨、付庄等遗址还发现少量秦王寨文化因素的鸭嘴形鼎足、深腹罐和网纹、平行线纹、垂帐纹等彩陶图案,表明鲁豫皖相邻地区是秦王寨和大汶口文化对峙的区域。就双方势力消长而言,大汶口文化中期时,秦王寨、大汶口文化因素基本相当,前者甚至还能在该区域乃至更远的豫东南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48],但随着大汶口文化扩张势头的增强,秦王寨文化在豫东及附近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尉迟寺类型发展壮大后,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达到顶峰并呈现“大汶口化”现象。控制豫东后,大汶口文化持续西进,深入秦王寨文化核心区。嵩山以南的沙颍河流域和以东的郑州地区是大汶口文化渗透最为深刻的区域,如谷水河一、二期^[49],中山寨五期^[50],北刘庄二期^[51]的圈足豆、尊形豆、长颈壶等均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大河村仰韶四期、郑州站马屯遗址^[52]的高领圆腹



图三// 秦王寨文化中期遗存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

1—3.长颈壶(75采:32、T23④:37、T23③:22) 4.双耳鼓腹壶(T61北扩⑤:27)
5.折肩瓶(H78:12) 6、7.圈足豆(H46:7、75采:36) 8.尊(H119:1) 9.高领圆腹罐(H78:14)
(1、7出自谷水河遗址,2、6出自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5、9出自站马屯遗址,其余出自大河村遗址)

罐、鬲、鼓腹壶、长颈壶、瓶、矮圈足豆、高圈足豆、细柄豆、尊等亦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图三)。嵩山以西和以北地区的陶器同样含有较多大汶口文化因素,如滩小关三期、王湾二期2段、东石寺三期^[53]的筒腹杯、圈足豆、尊形器、长颈壶等。

需要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对秦王寨文化的渗透不仅仅是壶、豆、杯等陶器因素的传播,同时还伴随人口迁徙。如河南平顶山寺岗发现一座仅随葬鬲、圈足豆、高柄杯、长颈壶、尊、觚形杯等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的墓葬^[54],墓主应是大汶口人。而且此类墓往往与秦王寨文化墓葬置于一处,反映出大汶口和秦王寨文化居民的关系应是和睦而非敌对的^[55]。赵永生等学者同样赞同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迁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例如在西山墓葬中发现颅骨人工改形和人为拔牙等大汶口文化居民特有葬俗,且“人骨上并无发现较大规模的暴力现象”^[56]。

这一阶段,郑州西北形成四个等级的聚落体系。第一级为双槐树遗址,面积约117万平方米^[57];第二级为汪沟遗址,面积约74万平方米^[58];第三级为青台、西山、大河村等遗址,面积30~40万平方米^[59];第四级聚落较多,面积约15万平方米^[60]。双槐树遗址北、西、南侧有黄河、伊洛河、嵩山、邙山等天然屏障,东侧有大河村—西山—青台—汪沟—楚湾等聚落或城址组成的弧形防御屏障,可以有效防御外来敌对族群侵扰,赢得相

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其发展出特大型聚落的根本原因。大约至秦王寨文化中期后段,西山城出现大规模修补重建迹象;大约至秦王寨文化中、晚期之交,双槐树遗址三条环壕逐渐填平,最东侧的大河村遗址开始修筑城垣^[61]。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大中型聚落内发现的灰坑葬就是明证。

综上,受大汶口文化的全面冲击,中原地区延续两千余年的仰韶文化系统彻底崩溃。中原腹地的文化特征和聚落形态都有了显著变化,仰韶和海岱文化因素交融并焕发新的生机。受此影响,聚落间相对均衡的状态被打破,聚落结构走向复杂化。当然,这种复杂化是“次生”而非“原生”的,受外力干预大。因此,秦王寨文化强盛时,郑州西北很快形成四级聚落体系,衰落时这一聚落体系则在庙底沟二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东西对峙中消失,而这也预示着中原腹地的文化秩序将会发生重大变革。

三、剧烈影响:中原腹地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

前文已根据最新年代学成果将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下限定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尉迟寺类型的结束时间可能也晚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62]。此时恰处于秦王寨文化晚期(即以大河村龙山早期为代表的阶段)。与此同时,晋西南和豫西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势头,江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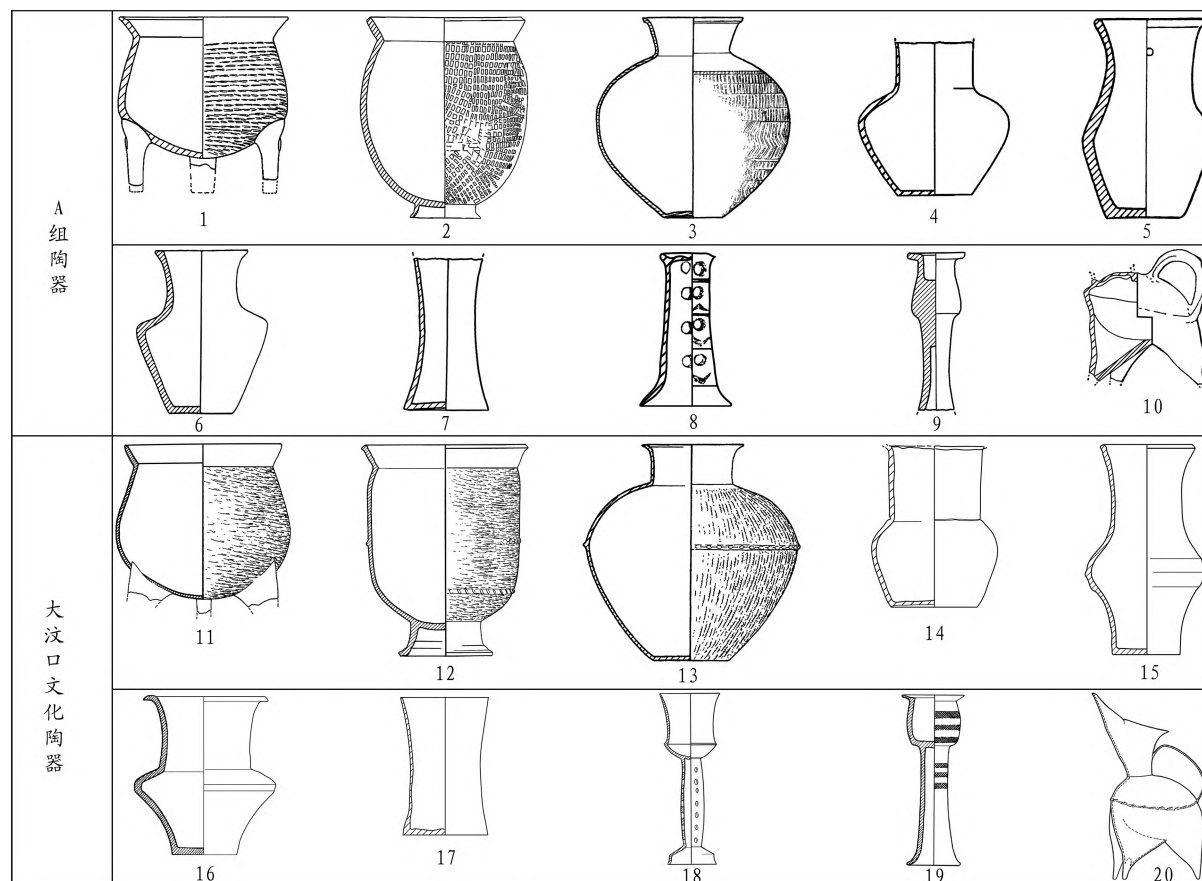
地区也完成了由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63]。在这些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中原腹地先前由秦王寨文化主导的格局被解构和重塑。

首先来看沙颍河流域。这一时期主要以河南禹州谷水河三期、前后屯^[64]、瓦店龙山早期^[65]、郾城郝家台一期^[66]、襄城台王一期^[67]、登封阳城龙山早期^[68]等遗址为代表,被称为“谷水河类型”^[69]。关于这类遗存的归属,学界存在争议^[70]。梳理相关考古材料不难发现,该类型陶器器形丰富,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另有极少灰黑陶、黑陶、红陶等;纹饰流行细绳纹、粗绳纹、横篮纹、斜篮纹、竖篮纹、弦纹、附加堆纹等。笔者依据文化因素不同,将之分为四组(图四—图六)。

A组陶器组合主要有罐形篮纹鼎、圈足篮纹罐、高领鼓腹罐、鼓肩壶、长颈壶、折肩壶、觚形杯、高柄杯、鬻、尊形豆等,B组主要有梯形腹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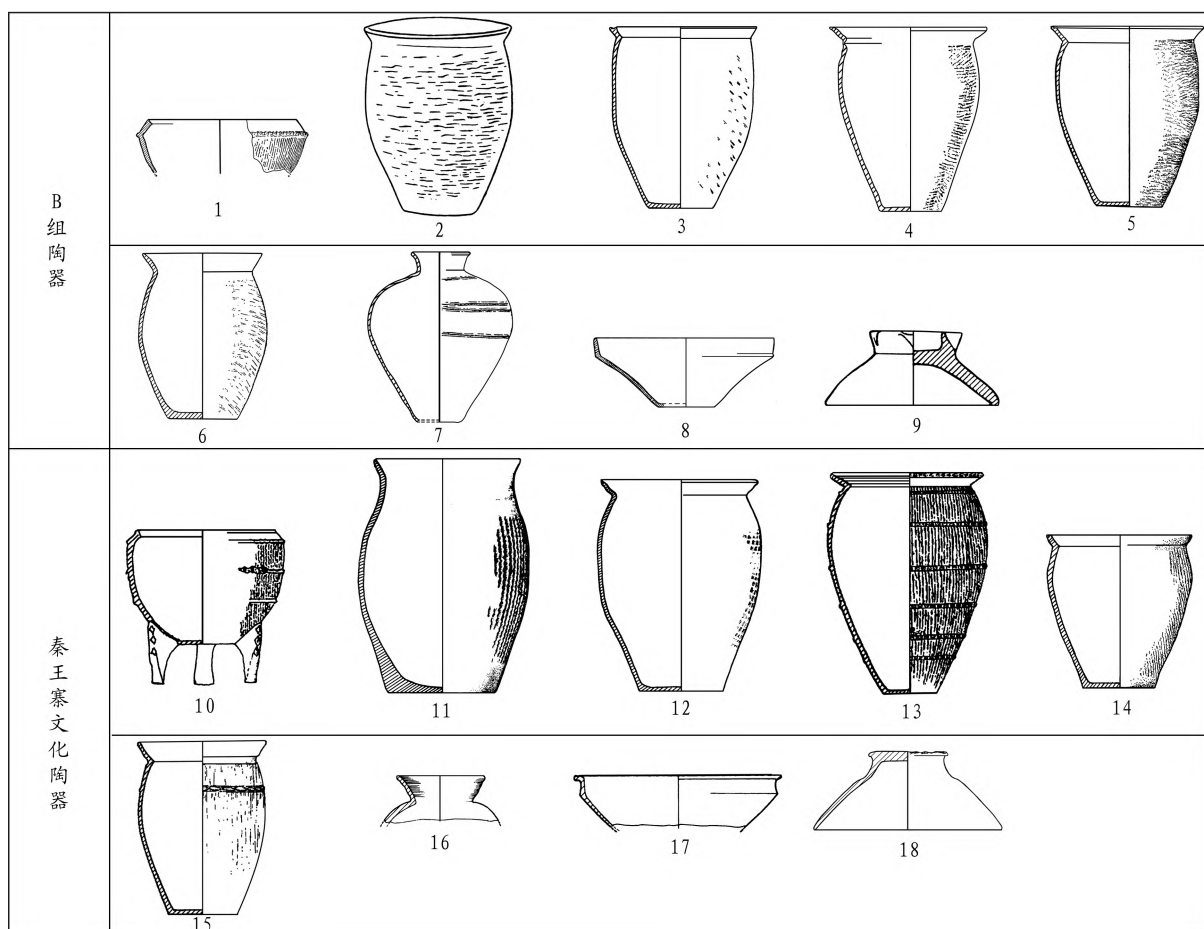
鼎、深腹罐、圆腹罐、小口高领瓮、折腹钵等,C组主要有圈足壶、三足盆、双腹盆、高圈足杯、高圈足豆、斜腹杯等,D组主要有小口斜肩罐、折腹罍、缸等。这四组陶器分别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秦王寨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存在较为强烈的共性因素,可归入以上各文化因素。就各组陶器的数量比例而言,A组因素最大,B组因素次之,C、D组因素再次之。显然,大汶口、秦王寨文化因素构成了谷水河类型的主体,而大汶口文化因素又明显多于秦王寨文化因素,这就表明,沙颍河流域约与秦王寨文化晚期相当的文化遗存面貌是由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主导的,据此可将谷水河类型归入大汶口文化。

观谷水河类型遗址的位置,可以发现它们基本是沿颍河由东南向西北分布的(图七)。且大汶



图四// A组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对比

- 1、11. 罐形鼎(T2806H198⑤:2、F88:4) 2、12. 圈足罐(T2008H22④:6、M227:2) 3、13. 高领罐(T42H253:1、M307:2)
4、14. 鼓肩壶(T2008F2红烧土堆积:2、F22:7) 5、15. 长颈壶(I T3A⑤:6、M25:4) 6、16. 折肩壶(I T3A⑤:5、M136:1)
7、17. 觚形杯(T2007H146:3、H42:1) 8、9、18、19. 高柄杯(Y1:73、T2806H198②:1、M141:12、F42:7) 10、20. 鬻(Y1:72、T3314⑥:2)
(3出自郝家台遗址,5、6出自瓦店遗址,8、10出自谷水河遗址,11—20出自尉迟寺遗址,其余出自前后屯遗址)



图五// B组陶器与秦王寨文化陶器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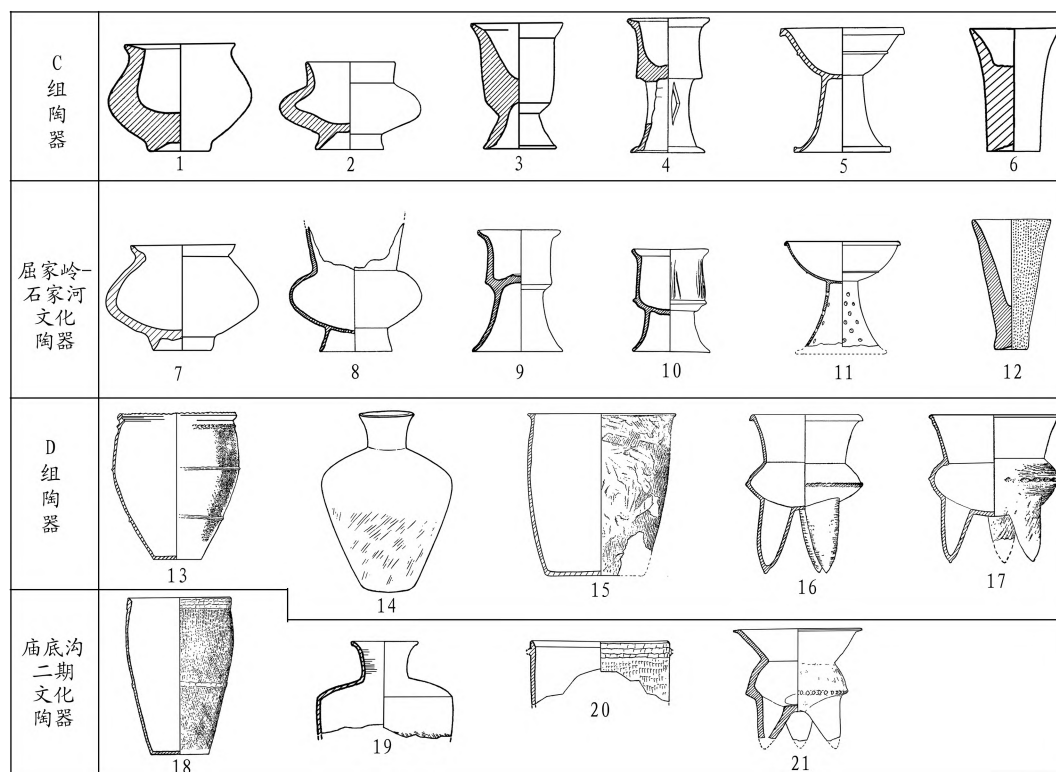
1、10. 罐形鼎(75采:12、H228:10) 2—6、11—15. 深腹罐(I T10⑤:1、I T3A⑤:2、T2H3:4、YT40H31:4、YT39H29:13、F4:4、F4:7、H978:2、H50:4、H551:15) 7、16. 小口高领瓮(H1:1、T42③:71)
8. 折腹钵(H2:29) 9、18. 器盖(75采:60a、T0102④:86) 17. 折腹盆(T30③:64)
(1、7—9出自谷水河遗址,2、3出自自瓦店遗址,4出自北沟遗址,5、6出自自阳城遗址,
11、12、18出自站马屯遗址,13、15出自西山遗址,其余出自大河村遗址)

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普遍见于沙颍河流域,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则常见于颍河上游而罕见于中下游。结合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郑州西北部极为罕见但却发现于东南部的站马屯遗址的情况,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占领伊洛河流域后很可能并未继续东进,而是沿伊河、颍河南下进入沙颍河流域,与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相遇并产生强烈碰撞。正是这两股势力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催生了谷水河类型。

根据前文所述,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对谷水河类型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渗透则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所以,笔者将其视为相对独立的遗存而未直接归入尉迟寺类型。而且,除大汶口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外,

谷水河类型中还有相当比例的秦王寨、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从秦王寨文化中期阶段延续下来的,有的则是从晚期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总之,沙颍河流域经过大汶口、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东西对峙,已彻底脱离秦王寨文化的控制。

再来看郑州地区。这一时期以大河村龙山早期^[71],西山六、七组^[72],站马屯一期等遗址为代表,被称为“大河村五期文化”^[73]。这类遗存的主体器形如敛口罐形鼎、深腹罐、小口高领瓮、敛口钵、折腹盆、大口缸、高领壶、圈足杯等均含有大河村秦王寨文化因素。另外房屋筑法、墓葬制度也与秦王寨文化一脉相承,如房屋墙体或地面逐渐摒弃火烤,流行土坯或夯土筑造;土坑墓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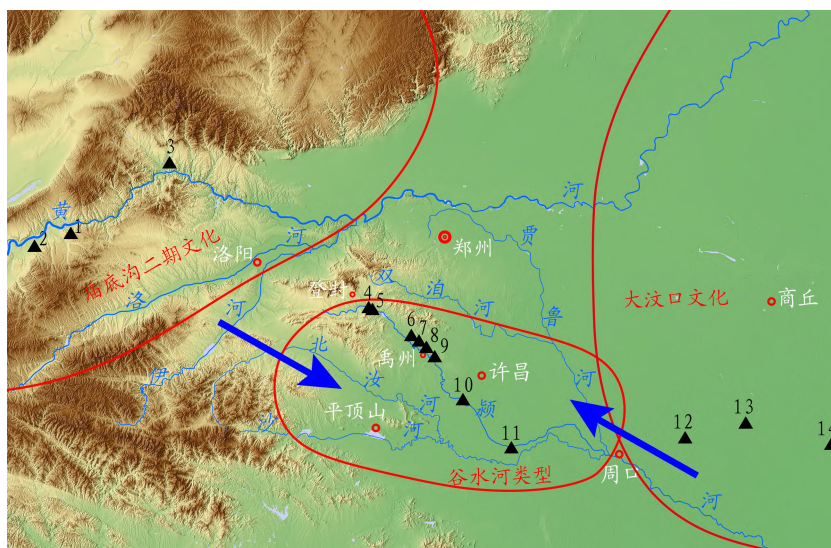


图六// C、D组陶器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对比

1、2、7、8. 壶(75采:43b、75采:34、T56③C:30、T45⑥:44) 3、4、9、10. 圈足杯(75采:45a、75采:39、F2北:33、F2北:18)
5、11. 圈足豆(T2007H146:2、F1:3) 6、12. 斜腹杯(T2307H38⑤:4、T71②A:35) 13、18. 深腹罐(M1:1、I H110:35)
14、19. 小口斜肩罐(I T3A⑤:3、I H185:33) 15、20. 缸(YT40H31:6、I H108:2) 16、17、21. 甗(YT39H29:9、YT39H29:8、H91:1)
(5、6出自前后屯遗址,7—12出自青龙泉遗址,14出自瓦店遗址,
15—17出自阳城遗址,18—21出自古城东关遗址,其余出自谷水河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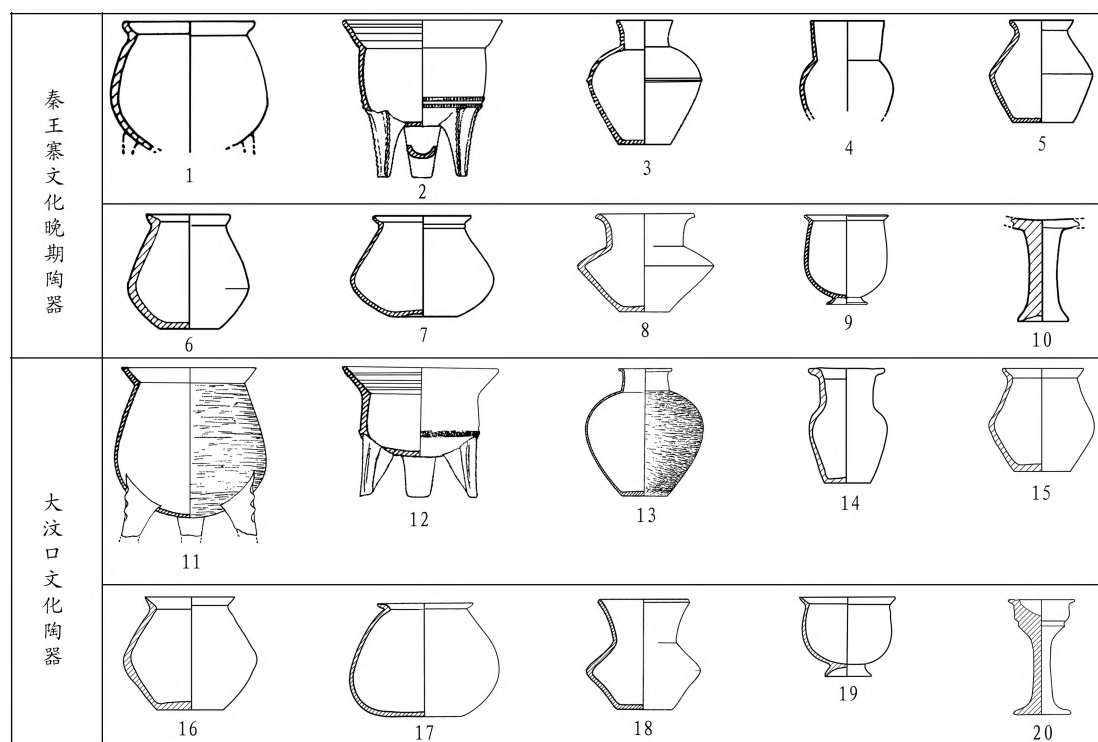
规格和瓮棺葬具组合基本一致,反映出稳定有序的社会传统。因此,“大河村五期文化”实为秦王寨文化的自然延续^[74],属于该文化的晚期遗存。

尽管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晚期遗存是中期遗存的自然延续,但也出现了一些外来因素(图八;图九)。如站马屯遗址高领折肩罐,西山遗址盆形鼎、尊形杯、鼓肩深腹壶,大河村遗址罐形鼎、鼓腹壶、折腹壶、垂腹壶、高柄豆等属于大汶口文化(西夏侯、尉迟寺类型)因素,站马屯遗址澄滤器,大河村遗址盆形鼎、折腹壶、矮圈足豆、双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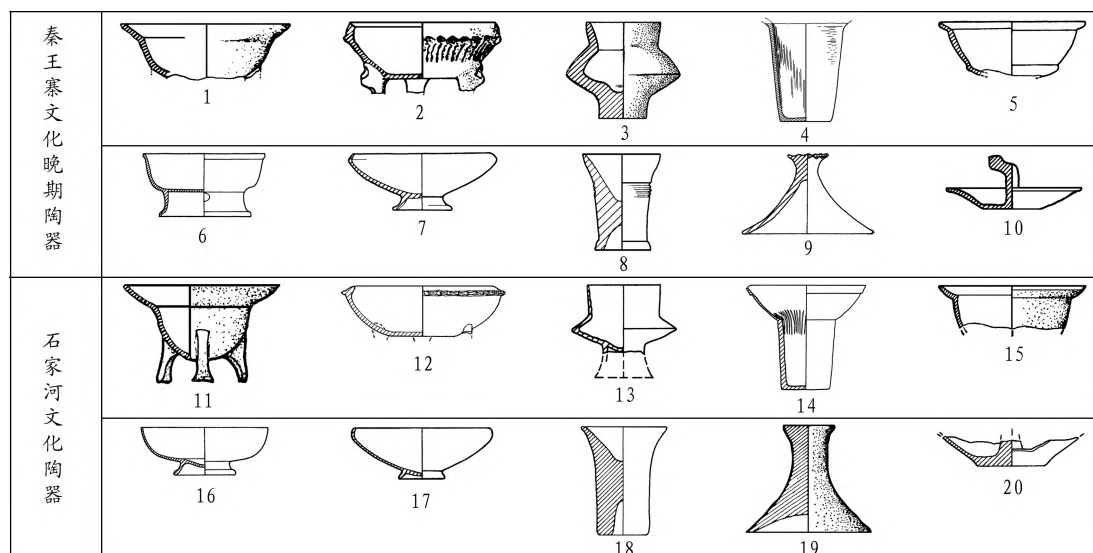
图七// 谷水河类型及相关遗址的分布情况

1. 陕县庙底沟 2. 灵宝河口 3. 垣曲古城东关 4、5. 登封北沟、阳城
6—9. 禹州瓦店、谷水河、前后屯、吴湾 10. 襄城台王
11. 郾城郝家台 12. 郸城段寨 13. 鹿邑朱台 14. 蒙城尉迟寺



图八// 秦王寨文化晚期陶器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对比

1、11. 罐形鼎(H147:1、F1:8) 2、12. 盆形鼎(H978:7、M40:29) 3、13. 小口高领壶(H1452:4、F85:3)
4、14. 鼓肩壶(T27④:6、M38:1) 5、15. 折腹壶(H117:6、M8:8) 6、7、16、17. 垂腹壶(T42③:19、H123:4、M39:26、F58:8)
8、18. 折肩罐(M46:1、F75:18) 9、19. 尊(H1452:3、M91:2) 10. 高柄豆(T42③:69) 20. 高柄杯(M46:36)
(1、4—7、10出自大河村遗址,2、3、9出自西山遗址,8出自站马屯遗址,13、17、18出自尉迟寺遗址,其余出自建新遗址)



图九// 秦王寨文化晚期陶器与石家河文化陶器对比

1、2、11、12. 盆形鼎(H224:2、T12③:21、T21②B:45、W13:1) 3、13. 折腹壶(H228:4、H56:64) 4. 澄滤器(F4:11) 5、15. 双腹盆(T25④:48、T4④:81) 6、7. 矮圈足豆(T23②:4、T43③:2) 8、18. 圈足杯(T42③:13、WNT1210⑫:7) 9、10、19、20. 器盖(T26④:28、H21:13、T8②:52、WNT1110⑨:8) 14. 擂钵(H43:20) 16. 圈足盘(灰土层3:2) 17. 圈足碗(WNT1604⑬:4)
(1—3、5—10出自大河村遗址,4出自站马屯遗址,11、15、19出自湖北随州西花园遗址,13、14出自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其余出自湖北随州金鸡岭遗址)

盆、圈足杯、器盖等属于石家河文化因素^[75]。郑州西北地区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较小,而东南地区相对而言较大,如站马屯大汶口文化因素(高领罐、折肩罐、鬲、长颈壶、折肩瓶等)比例与秦王寨文化因素相当。但总体而言,这里的外来因素并不占优势,也因此未能中断秦王寨文化的发展进程。

最后来看伊洛河流域和太行山南麓。这里形成了甲、乙两类遗存,甲类以王湾二期四段H194、H487,偃师“滑城”H1、H2^[76],二里头78YL IV H1^[77],孟县许村遗址^[78]为代表;乙类以孟庄龙山文化早期^[79],新乡尚村^[80]、后高庄遗址^[81]为代表。甲类遗存典型器形有盆形和罐形带双鋈鼎、鬲、宽折沿盆、篮纹深腹罐、小口篮纹斜肩罐、小口篮纹高领瓮、尖底深腹缸、敛口钵、高圈足双腹豆、单耳杯、觚形杯、筒腹杯、大捉手器盖等,特征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类器大同小异^[82],属该文化无疑。乙类遗存典型器形有彩陶钵、彩陶盆、彩陶罐、深腹罐、釜、尊形器、小口斜篮纹高领瓮、折沿弦断篮纹深腹罐、长颈壶、觚形杯、圈足杯、筒腹杯、圈足豆等,是大司空文化融合庙底沟二期、秦王寨、大汶口等文化因素形成的,学界曾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83],笔者表示赞同。

值得一提的是,伊洛河流域以滩小关四期H14、里沟T5②和T9④^[84]、双槐树五期^[85]等为代表的遗存,典型器形组合有梯形腹罐形鼎、折沿篮纹或绳纹深腹罐、花边口沿篮纹深腹罐、敛口钵、圈足或假圈足碗、双腹盆、长颈壶、圈足碗形豆、筒腹杯、尊形杯、折腹杯、觚形杯等,绝大部分器形都是从本地秦王寨文化中期陶器中直接沿用或经过一定演变而来的,同样是秦王寨文化的继续发展。此类遗存虽然少见大汶口文化因素,但却同时受到庙底沟二期和屈家岭文化的强势影响^[86],最终也彻底脱离了秦王寨文化的控制。

综上,秦王寨文化晚期以来,中原腹地的文化面貌随着大汶口文化为首的外来文化的持续渗透而发生了剧变,文化格局得以重塑:沙颍河流域完全被大汶口文化占据并发展出谷水河类型;伊洛河流域和太行山南麓相继被庙底沟二期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占据;郑州地区及伊洛河下游的秦王寨文化虽然发展到晚期阶段,但却受到周边文化的制约。

四、结语

纵观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演进

过程,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中原地区一直是以本地传统引领发展潮流,周边文化对该区的影响并不多。到了仰韶文化晚期,这种境况发生转变,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周边文化进入中原腹地,随后影响整个中原地区。中原腹地受此影响最为显著,文化面貌最先改变,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一支“混合型遗存”,即秦王寨文化。

秦王寨文化存续期间,嵩山以南的沙颍河流域是受大汶口文化冲击最强烈的区域,文化面貌从初期的“多元因素融合”到其后的显著“大汶口化”,再到最后的彻底融入大汶口文化发展进程。嵩山以西的伊洛河流域和以北的太行山南麓同样受大汶口文化冲击,但因庙底沟二期和屈家岭文化的强势扩张,这些区域虽逐步脱离秦王寨文化控制,但未融入大汶口文化发展进程,而是形成诸如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之类的混合型遗存。郑州地区是最早形成秦王寨文化也是唯一贯穿该文化发展始终的区域,不但未被大汶口文化“同化”,反而形成由大河村—西山—青台—汪沟—楚湾等城址或环壕聚落构成的弧形防御屏障,标志着这里的聚落结构和区域社会组织走向分化。

大汶口文化对中原腹地的影响是持久且广泛的,彻底改变了该区文化面貌被中原系统主控的状态。郑州地区、沙颍河流域、伊洛河流域、太行山南麓各自在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二期、屈家岭等文化的交融背景下生成新的地域文化类型,奠定了不同特质龙山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基础,引领着这些文化遗存的发展导向。此外,大汶口文化器物、人口的融入使得中原腹地的社会形态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这里在原本就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始营建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的高等级聚落或城址,中原地区的社会重心也逐渐由陕豫晋相邻地区转移到嵩山附近。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悉心指导,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卢瑞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江运为大汶口文化遗存辨识提供帮助,谨致谢忱!

[1]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102页。

[2] 靳桂云:《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年代学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23年8月25日第6版。

[3] a. 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

- 1981年第3期。
- b. 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 c.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 d. 张翔宇:《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浅析》,《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 e. 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
- [4] 秦存誉:《秦王寨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31—146页。
- [5] 魏兴涛:《中华文明起源路径与模式的中原考古观察》,《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 [6] a.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续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3—24页。
-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三)》,《考古》1996年第7期。
- [7] 王良智:《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时空框架与谱系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22—231、240—251、273—276页。
- [8] a. 侯卫东:《商代早期中原腹地中小型城邑的形成背景研究》,《考古学集刊》第23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 b. 常怀颖:《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蠡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
- c. 鲍颖建:《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页。
-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 [10] 李友谋:《裴李岗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92—108页。
- [11] 崔宗亮:《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90—110页。
- [12] 段天璟、步蕃:《晋南豫西地区仰韶时代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考古》2023年第10期。
- [13]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 [14] a. 韩建业:《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
- b. 韩建业:《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年代的区域性差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十五)》,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8—110页。
- [15] 朱雪菲、许永杰:《西阴文化的解体与仰韶晚期遗存的生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
- [1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1—222页。
- [1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 [18] a. 阚绪杭:《试论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5—139页。
- b. 陈艳:《试论侯家寨文化》,《东南文化》2016年第2期。
- [19] 袁广阔、崔宗亮:《河南虞城马庄第五层遗存的发现及意义》,《考古》2020年第3期。
- [20] a. 韩维龙、秦永军:《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论仰韶文化》。
- b. 张志华:《试论周口地区大汶口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 [21] a.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2页。
- b.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9、114—132页。
- [22] 孙明:《商丘地区仰韶文化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论仰韶文化》。
- [23]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 [24] 郑州大学考古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尉氏县文管所:《河南尉氏县椅圈马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 [25] 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 [2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 [27]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 [28]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 [29] 同[16],第214—216页。
- [3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 [31] 同[7],第222—231页。
- [32] 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69页。
- b. 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6—172页。
- [3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巩义市滩小关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2年第4期。
- [34] 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 [3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 [36] 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

- 地》,《考古》1981年第1期。
- [3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988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1期。
- [38]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170、244—274页。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170、202—223页。
- [39]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肖县花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2期。
- [40]a.孔玥:《安徽省亳州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b.张小雷:《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70页。
- [41]a.同[28],第82—103、141—182页。
b.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50—94页。
- [42]同[26],第19—22、39—92页。
- [4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曲阜南兴埠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 [44]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西夏侯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 [4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50、86—141页。
- [46]a.同[1],第69—113页。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292页。
c.张鑫:《大汶口文化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5—116页。
- [47]a.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
b.王吉怀:《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 [48]a.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市党楼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5期。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罗山县李上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
c.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信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罗山县擂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
- [49]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
b.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 [5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 [52]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站马屯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2012年第4期。
c.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站马屯遗址仰韶文化遗存2009—2010年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12期。
- [5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武陟东石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7年第2期。
- [54]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年第5期。
- [55]同[3]d。
- [56]赵永生、肖雨妮、曾雯:《从人骨材料谈大汶口文化居民西迁》,《东南文化》2019年第5期。
- [5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 [58]顾万发:《文明之光——古都郑州探索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3页。
- [59]a.同[58],第19—20页。
b.同[16],第5页。
- [60]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253页。
- [61]刘文思、刘亚玲:《2021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华夏考古》2022年第2期。
- [62]a.同[47]a。
b.张蒙豫:《尉迟寺文化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9—21页。
- [63]同[7],第252—262页。
- [64]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禹州市前后屯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4期。
- [6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第38—40页。
- [6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2—27页。
- [6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襄城县台王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 [6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05—210页。
- [69]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

- 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6—172页。
- [70]a.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 b.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6页。
- c.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考古》2017年第8期。
- d.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46—378页。
- [71]同[16],第415—434页。
- [72]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 [73]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论仰韶文化》。
- [74]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 [75]a.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63页。
-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鸡鸣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177页。
- c.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6—181页。
-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年第5期。
- [7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孟县许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2期。
- [7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5—86页。
- [80]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新乡市牧野区大桥·珑府工地龙山文化遗存的发掘》,《新乡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 [81]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乡县文物管理所:《河南新乡县后高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 [82]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4—76页。
- b.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 c.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1—327页。
- [83]同[70]a。
- [84]a.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巩义市文物保管所:《河南巩义市里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6期。
- b.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里沟遗址1994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 [85]同[57]。
- [86]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宜阳苏羊遗址下村区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

Disruption and Reshaping: The Staged Impact of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Dawenkou Culture on the Central Plains

QIN Cun-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Dawenkou Culture had a profound and multi-phased impact on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he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first phase, this expansion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Qinwangzhai Culture, which in turn played a key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Zhengzhou area, the Shaying River basin, the Yiluo River basin, and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During the second phase, these regions underwent a process of “Dawenkou-ization,” as external artifacts and populations were increasingly absorbe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shifts in local cultural trait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The societal center in the Central Plains began to shift from the tri-border area of Shaanxi, Henan, and Shanxi toward the Songshan region. In the third phase, the Dawenkou expansion reshaped the broader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le the Qinwangzhai Culture continued to persist in the Zhengzhou area, other regions wer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Dawenkou and Late Miaodigou Phase II Cultures, or gave rise to new cultural types.

Key words: Dawenkou Culture; Qinwangzhai Culture; Central Plains heartl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黄苑;校对:张平凤)